

一、2018 年「第 3 屆亞投行年會」會議概況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李志強主稿

- 各國政府無力承擔公共投資增加的債務負擔，吸引私部門資金投入基礎建設成為必要選項。
- 印度對基礎設施需求龐大，已成為亞投行最大借款國和獲益者。
-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加強全球和區域合作倡議以及借款國發展戰略對接，滿足成員國多元化的發展需求。
- 亞投行信用評比高，計畫年內發行債券，擴大貸款規模以增加國際影響力。

由中國大陸倡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第 3 屆理事會年會於今年 6 月 25 至 26 日在印度孟買舉行，包括成員國的代表團、國際組織代表、全球財金界人士等約三千多人參加。印度總理莫迪出席開幕式致辭，大陸方面則由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率團出席。本次年會選出盧森堡理事為第 4 屆理事會主席、新加坡理事和埃及理事為副主席；並決議第 4 屆理事會年會將於 2019 年 7 月 12 至 13 日在盧森堡舉行。亞投行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從最初只有 57 個創始成員國增加至今年 6 月的 86 個，規模已超過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開行）的 67 個成員國；本屆年會通過黎巴嫩加入亞投行，成為第 87 個成員國，目前七國集團（G7）中只有日本和美國還沒有加入。這次年會的焦點和未來動向包括以下四項：

（一）要吸引更多私部門資本

今年年會主題為「助力基礎設施融資：創新與合作」，並首次舉辦亞洲基礎設施論壇，探討如何吸引更多私部門資本投入基本建設，早在開幕式舉行的前一天，年會就已安排多場相關議題的對話會議。據亞投行估計，目前亞洲基礎設施仍有數兆美元的資金缺口；交通領域除港口外，將來還要投資鐵路、機場等項目，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發電、輸變電工程對於改善亞洲落後國家的貧困生活很有幫助。但僅依靠各國政府和多邊銀行的投資仍然是不足夠的，這也是此次年會議

題聚焦在動員私人資本參與基本建設的原因。很多亞洲發展中國家嚴重缺乏基礎設施，但如果動用大量公共資本來投資，可能會增加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因此調動私人資本參與就顯得非常必要。

（二）印度已成為最大借款國

由於對基礎設施需求龐大，印度已經是亞投行最大的借款國和獲益者。亞投行成立的前兩年，在基礎設施項目上的貸款總額已達 40 億美元，其中對印度的貸款金額最高，6 個投融資項目共計 12 億美元，占亞投行貸款總額近 30%。在今年年會上，印度作為主辦國也召開多個研討會，強調印度推動基礎設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亞投行將進一步對印度貸款 2 億美元，用於道路、住房和城市發展。第一期 1 億美元已經獲得亞投行董事會批准，第二期 1 億美元投資也將進入討論階段。

（三）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關係將更密切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是在中國大陸倡議下推動的，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年會上還特別提到兩者的關係，認為亞投行作為國際機構，要按照國際機構準則運作，但「一帶一路」在促進國際合作上提供亞投行發展機會，兩者可以相輔相成，所以亞投行要理所當然的支持「一帶一路」。亞投行開業以來，所有的貸款項目都貸給「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在本屆年會期間，亞投行特定安排與「一帶一路」對接的互聯互通主題研討會，今年亞投行也支持首個非亞洲國家—埃及的太陽能投資項目。作為最大的出資國，中國大陸財政部副部長鄒加怡在年會中也表示，亞投行應更加注重與「一帶一路」等全球和區域合作倡議以及借款國發展戰略相對接，以滿足成員國多元化的發展需求。

（四）未來會發行債券拓寬集資管道

從成立以來，亞投行的貸款項目不斷快速增加，至今已批准的貸款總額達 53.4 億美元，共帶動各種公共和私人資本 300 多億美元投入基礎建設。亞投行大約三分之二的貸款是與世界銀行或亞開行等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一起進行的聯合貸款，對項目審查的慎重態度得到外

界不錯的評價，因此 2017 年國際三大信用評等機構包括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都先後給予亞投行「AAA 級」最高信用評等，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也評定亞投行零風險權重。在成員國數目已超過美日主導的亞開行的形勢下，亞投行要擴展影響力就必須進一步擴大貸款規模。目前亞投行主要是利用自有資本進行融資，在極佳的信用評等下，將計劃年內首次發行債券，作為籌措資金的額外管道。

二、美國近期友臺法案通過及後續可能發展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盧業中副教授主稿

- 年初「臺灣旅行法」獲參眾兩院無異議通過，川普簽署，希促成美臺高層互訪；參眾議員後續亦提出類似提案，雖對行政部門無拘束力，但具高度政治象徵意義，美臺關係實質進展。
- 「2019年國防授權法」等多項法案提出，擴大美臺軍事交流合作，確認對臺軍售重要性，亦凸顯美國對中國大陸軍事、貿易等實力成長疑慮加深。
- 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受阻，美參眾議員提案要求總統、國務卿或其代表支持臺灣參與多項國際組織，相關法案尚在參眾院討論。
- 美中貿易戰仍激烈，預期美國會將持續推動友臺法案反制中共；臺灣應持續注意美國行政部門執行情況，並因應中共報復行動。

（一）前言

年來美國與臺灣關係呈現正面成長，除了美國在臺協會新址於6月12日落成，另美國國會自1月以來通過多項友臺法律、法案及決議案等。美國國會的友臺舉動，原因包括臺灣與美國的經貿往來密切，我國是美國的第10大貿易夥伴及第14大出口市場。

此外，對照中國大陸近期加強控制內政，美眾議員 Brad Sherman（加州民主黨籍）等認為臺灣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民主盟友（democratic ally），具有燈塔效應，也是美國繼續在區域間推動民主價值不可或缺的要角。中國大陸對臺灣國際參與限制以及軍事恫嚇等舉動，也成為美國會通過相關法案的助力。當然，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雙邊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的惡化，更是促成華府政策圈對中國大陸觀感大幅改變的環境因素。當前華府政策圈的主流意見大致已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者與現狀挑戰者。

對我國而言，我們應當對該等法案之支持表示感謝，同時亦需留意法案討論之時機並區隔象徵與實質意義。

（二）政治面向：「臺灣旅行法」及共同決議

在政治面向之法案方面，2018 年 2 月底由參眾兩院無異議一致通過並成為法律的「臺灣旅行法」(Public Law: 115-135) 最值得關注。此項法案原先由長期友臺的眾議員 Steve Chabot (俄亥俄州共和黨籍) 與其他 81 位眾議員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提出 (H.R. 535- Taiwan Travel Act)，後經過院內討論並送交參議院。參議院於今年 2 月底無異議且無修正地通過該法案並成為法律，於 3 月 5 日送交總統簽署。正值國會開議期間，美國總統有 10 天的期限可以退回或簽署該法案，若超過此期限未簽署，則法案自動生效。川普總統選擇在期限最後一天，也就是 3 月 16 日簽署，凸顯其個人對於此法案之態度以及對臺灣之支持。

這項法案之重點，可以由參、眾兩院在法案審議期間的各項發言記錄看出。多位對我友好的眾議員強調，美國透過「臺灣關係法」及雷根政府以來的「六項保證」維持兩岸及區域的穩定和平，但臺灣已歷經民主化，美國理當放寬對於美臺高層官員互動的限制，並希望能促成美國內閣官員訪臺，以及臺灣民選總統、外交及國防部長等訪問華府。

另一發展是國會提出的共同決議案。此類決議案對於行政部門並無拘束力，多屬國會為特定議題而表達其立場。在 5 月間臺灣連續失去巴拿馬與布吉納法索兩個邦交國後，眾議員 Dana Rohrabacher (加州共和黨籍) 於 6 月 20 日提出呼籲美國與臺灣恢復外交關係的決議案 (H.Con.Res. 124)，目前正提交眾院外交委員會。6 月 14 日，美國在臺協會 (AIT) 內湖新館落成後，參議員 Cory Gardner (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 提出承認美臺緊密關係及 AIT 強化該關係之重要角色共同決議案 (S.Con.Res.40)，目前在參院外交委員會。

此等法案與決議案，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眾議員 Ed Royce (加州共和黨籍) 即指出，自 1979 年以來，美國總計僅有 6 位內閣級官員訪問臺灣，與緊密的臺美關係似乎不成比例。然在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出美臺關係在經貿互動、民眾往來、乃至軍事交流等方面仍有實質進展。

（三）安全面向：「2019 年國防授權法」等

「2019 年國防授權法」(NDAA 2019) 可說是美國國會近期試圖強化

美臺軍事關係最重要的法案。4月13日，眾議員 Mac Thornberry（德州共和黨籍）提出此法案（H.R.5515），試圖強化臺灣國防力量、擴大美臺軍事訓練合作與軍售、以及美臺軍事高層人士之交流。眾院及參院雖接續於5月與6月通過此法案，但對於內容仍有部分歧異。就7月下旬公布之版本看來，雖然刪除參院版本的要求美軍參與臺灣漢光演習等內容，但強化美臺軍事合作的精神持續存在。參眾兩院就對此法案之差異協商完成後，將再送交美國總統完成立法程序。

「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是第二項重點，係由參議員 Cory Gardner（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與其他9位參議員於4月24日所提出（S.2736），希望美國能反制北韓與中國大陸影響亞洲穩定的各項作為。法案內容主要是希望發展出長期戰略視野，以及更為全面性的美國對印太區域的政策。依據該法案，未來5年美國將有15億美元之預算要配置在此區域，以強化聯盟關係以及如南海等區域關鍵航道，以符合川普政府對於維持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之戰略構想。其中與臺灣有關的部分在於再次確認「臺灣關係法」及軍售對臺灣的重要性，並呼籲總統應執行「臺灣旅行法」。

第三項法案是「臺灣安全評估委員會法案」，由眾議員 Don Bacon（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籍）於5月7日所提出（H.R.5680），要求國防部成立臺灣安全評估委員會，以評估臺灣的國防實力並提出幫助臺灣建構自我防衛實力的建議。有評論認為，此項法案的提出是對中國大陸施壓以迫使其在貿易議題上讓步。

此等法案與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疑慮至為相關，美國會近期也討論了許多與中國大陸貿易作法相關的法案並多所譴責。「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於5月15日進行聽證時，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表示，國務院對於北京近期要求企業界必須依中國大陸之法律與政治正確行事等發展應受到譴責，並表示若中國大陸仍執意擴張其「政治正確」，將影響中美關係，這使得臺美安全關係受到關注。

（四）臺灣的國際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重點

我國於今年5月間仍未能獲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及2016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於邀請函中所加註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關字樣，引起美國國會關注。2017年7月19日，眾議員 Ted Yoho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 提出法案 (H.R.3320)，要求國務卿提出策略，以協助臺灣重獲 WHA 觀察員地位。本年1月9日，眾議院口頭表決通過該法案，並提交參議院。參議院於4月19日由 James Inhofe (奧克拉荷馬州共和黨籍) 等4位參議員提出近似法案 (S.2716)，目前正送交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審議。值得注意的是，兩院版本相當雷同，特別在先前通過法案 (Public Law 108-235) 之基礎上，要國務卿就臺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之策略進行報告，直到臺灣重獲該地位為止。此外，兩院版本在臚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歷程時，除提到各國協助與努力之外，均提到是「在兩岸關係增進之際」(during a period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臺灣自2009年起得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未來若參議院通過自己的版本，則兩院將討論出一共同版本並重新表決，再送總統簽署。

2018年世界衛生大會開議後4天，參議員 Cory Gardner (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籍) 與 Edward J. Markey (麻薩諸塞州民主黨籍) 5月24日共同提出「2018年臺灣國際參與法案」(S.2962)，回應中國大陸歷來打壓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該法案並要求美國總統及其代表，就臺灣參與相關適當國際組織，向中國大陸提出質疑，並指示各國際組織中的美國代表應利用發言機會與投票權，確保臺灣的聲音被聽見。目前該法案已呈交參院外交委員會。

(五) 未來可能發展

近期美中之間因為貿易戰的可能性增加而呈現高度不確定，而向來對我國友好的美國國會於此期間所討論或通過的各項法案，也都有高度的反制中國大陸的因素在內。未來，在中國大陸沒有具體改變其行為之前，這樣的趨勢可能持續下去。

對於我國而言，此等法案有助我強化實力，且顯示國會對我仍為跨黨派的支持，應當表示歡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法案在國會討論時用字遣詞多較強烈，如對行政部門的要求以具強制性的「應」(shall)

呈現，但最後成為法律的版本通常以建議性質的「得」(should)呈現。相關法案行政部門如何執行，仍待後續觀察。與此同時，北京方面對美國會此等作為如何解讀、是否持續言詞恫嚇或對臺施以報復，也是我們無法迴避之挑戰。

三、近期中共對臺青年交流政策之評析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曾于蓁主稿

- 太陽花學運後，中共意識到對臺青年工作重要性，近年推出多項針對臺灣青年就學、實習、就業到創業的措施，已成為對臺政策重要環節。
- 兩岸交流在許多層面皆放緩，惟青年交流在就學、實習、就業到創業等層面更深入、頻繁及具持續性，可謂「青年交流 2.0」。
- 中共對臺青年統戰手腕更新，不再只是短期人際交流，而是著重經濟利益，希冀藉此產生對中國大陸長期依賴和認同。
- 臺灣仍具青創優勢，應對本身制度、文化、社會有信心，持續推動友善青創的政策。

（一）中共對臺灣青年交流梗概

中共「十九大」後，對臺政策趨向「原則清晰、戰術靈活」軟硬兩手並進策略。原則部分，中共堅持兩岸官方互動需在「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下才能持續開展；但在官方互動呈現僵局的同時，中共開始強調兩岸需融合發展，意在擴大兩岸民間在經濟、社會、教育等交流，尤其在對臺青年工作上，更為此波融合發展的重中之重。

中共加大對臺青年交流工作，始於 2014 年臺灣社會爆發「太陽花學運」，其意識到對臺青年工作存在盲點，有必要創新交流方式，爭取臺灣青年族群的認同。因此，可見到近期中國大陸開展對臺青年交流工作舉措頻頻，如 2015 年初中國大陸「兩會」在涉臺政策內容上，首度特別強調要為臺灣青少年多做工作，加強青年交流是未來對臺工作重點；2016 年 6 月在福建廈門舉行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更加聚焦「青年」主題，並且結合近年來大陸主打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旋律，新增青創先鋒匯、海峽青年論壇、兩岸青年企業家對話等活動，爭取更多臺灣青年赴中國大陸創業。2017 年 3 月，俞正聲在「兩會」期間提及：「加強與臺灣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2018 年「兩會」開幕前夕，中共國

臺辦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我方所稱之「對臺 31 條措施」),大陸各省市在此政策基調下亦接續研擬相關實施細節與政策配套,例如位於福建的廈門市政府,其作為對臺政策的主要「試點」重要省市,推出總計 60 條包含各種領域的對臺措施,涵蓋範圍甚至超越中共中央所訂立的 31 條內容。其中,在對臺灣青年的相關作為上,從就學、實習、就業到創業等一系列過程,均訂定相關配套措施。由此顯示,做好臺灣青年工作,已成為中共對臺政策之重要環節。

(二) 近期政策的總覽

在兩岸交流諸多層面降緩速度、停頓的同時,青年這一塊未曾放緩速度,甚至,青年交流還邁向更深入、頻繁更具有可持續性之趨勢前進,可稱之為「青年交流 2.0」時代。

在吸引臺生赴陸就學方面,諸多重點高校調整分數,過去在臺學測需達到前標(前 25%)始能申請大陸高校。2017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印發「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有關事項的通知」指出,自 2018 年起,臺灣學測分數達均標(即達參考人數總數的前 50%)的高中畢業生即可免試申請大陸大學就讀。

另外,吸引臺青赴陸實習就業與創業,則是建立制度平臺,推出優惠政策讓臺灣青年自主創業或是與陸青年共同創業,包括提供創業基金、導師、辦公室租借補貼以及企業落地相關法律服務等。此外,也透過與高校、臺商協會、臺灣青年聯合會等團體組織結盟的方式,組成青創聯盟、投資共享中心,為臺灣青年赴陸創業提供資訊推播、市場媒合以及籌集資金等服務。2018 年 5 月,大陸國臺辦釋出新設立的 22 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青創基地)和相關示範點,加上過去已設立之 53 個,累計共 75 個青創基地。同時,亦有政策支持臺灣大學生赴陸實習,企讓其融合在大陸市場當中。

(三) 分析與評估

綜合而言,現階段大陸對臺青年工作,已不再只是簡單的人際社

會接觸，而是更加突出了經濟利益。過去中共對臺灣青年的統戰，主要是圍繞在擴大兩岸青年的接觸與交流，這種形式的群際接觸，或許在短期內可以增加臺灣青年對大陸的好感，但由於欠缺實質的誘因或獲利，因此這種效應很難長久持續。近年來，中共透過更新的統戰手腕，其中以青創基地為代表，希冀透過該基地的運作，讓赴陸臺灣青年獲得利益，而產生對大陸的長期性依賴與認同。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人才競逐與流動，本屬正常現象，惟大陸推出的青創基地等政策具政治目的，但臺灣在制度、社會環境或政府效能上，有一定的水準，如 2018 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 評比，臺灣位居全球 18 名，遠高於中國大陸的 43 名。換言之，創業並非給予資金即可獲利，還與創業地的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我們對臺灣的制度環境具備信心，若能強化我國對世界人才吸引政策條件、鼓勵青年創業政策更加友善，持續與業界產學合作讓有意者學用合一，相信在比較兩岸在制度、文化與社會的差異後，我方有條件吸引更多優秀青年投入創業與建設的行列中。

四、從近期陸卡車司機串連罷工事件觀察中國大陸維權行動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王占璽主稿

-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不公平管理、貨運司機薪酬及工作環境不佳，引發聯合罷工行動；陸方勞工權益缺乏保障，罷工運動漸增。
- 中國大陸勞工權利意識及行動能量快速增長，試圖透過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維護合理權益，對中央政府造成壓力。
- 電商服務平臺崛起壟斷市場資訊，對司機薪酬及勞雇關係造成不利影響，其他產業亦有類似事件，勞工權益惡化。
- 中國大陸政府採取社會管控和社福推動的軟硬兩手策略，仍無法解決社會矛盾及不穩定；勞工維權運動的強大生命力或衝擊中共統治權威和社會穩定。

（一）前言

中國大陸各地卡車司機因工作條件日趨惡劣，在 6 月上旬發動全國性的聯合罷工行動。據悉，這次罷工以 6 月 10 日作為全國統一罷工日，而自 6 月 8 日起各地的零星罷工事件便開始出現，範圍涵蓋江西、山東、四川、安徽、湖北等 12 個省市，集結參與罷工的司機達到數萬名。各地卡車司機反映，貨運行業持續面對地方政府不公平的管理，包括各地公路胡亂收取過路費、交警隨意攔截及罰款。另一方面，近年來以電子商務為基礎的貨運服務平台興起，並在壟斷貨運市場資訊後開始持續壓低司機的運費，使卡車司機的工作條件雪上加霜。而罷工司機除了要求調整薪資、改善工作環境外，也呼籲全中國大陸 3,000 萬名卡車司機共同加入罷工行列，向中國大陸政府表達訴求。

這次卡車司機罷工以改善工作條件為訴求，是典型的勞工抗爭運動。依據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統計，近年來中國大陸勞工罷工運動的數量持續增加，公開報導的罷工事件在 2011 年不到 200 件，2017 年已增加至 1,256 件；而在 2018 年的前十週內，罷工數量已經超過 400 件，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在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加強資

訊及媒體控制的氛圍下，實際的罷工事件恐怕為數更多。此一趨勢說明了勞工權益的缺乏保障，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持續存在的不穩定因素。

然而，這次卡車司機罷工並非只是眾多罷工事件中的一個案例，在其組織模式與抗爭訴求中，呈現出當前中國大陸勞工維權運動的一些重要變化。

（二）全國串連：新型態的勞工抗爭模式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勞工抗爭運動層出不窮，而在大規模的勞工罷工事件中，雖然亦可見到動輒上萬人參與的案例，但絕大多數仍未超出一廠（如 2016 年沃爾瑪員工聯合罷工）或一地（如 2016 年黑龍江雙鴨山市礦工罷工）的範圍，說明罷工運動主要的動員機制仍受限於地理條件，而訴求的對象也聚焦在特定工作場域中的資方或地方政府。然而，此次罷工在行動的範圍上跨越十數個主要省分，發動罷工的卡車司機群體也在一開始就強調各地將同時發動集體的抗議行動。此種集體行動模式呈現出不同區域的勞工已經產生共同的利益認同，並且能透過緊密的橫向聯繫進行動員及協調。同時，罷工的訴求對象也不在僅限於某地政府，而是在全國層次上要求改善行業內的工作條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對中央層級的政府部門產生壓力。

事實上，類似的罷工型態在今年來已經連續出現。在 4 月底，中國大陸各地塔吊司機已經開始策劃「五一大罷工」的抗議行動。各地塔吊司機表示，他們長期處於高危險、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工資停漲的惡劣工作環境中，而基本勞動權益也未能獲得政府重視與保護。因此在 18 個省份 40 多個城市中的塔吊司機，陸續以拉橫幅，喊口號等方式提出加薪與改善工時等訴求。而在 5 月 1 日當天，雖然在各地政府的嚴密監控下，各地實際上並未出現大規模的罷工，但已說明全國大罷工的抗爭型態已經在不同產業出現。而此一現象也說明當前中國大陸社會內部，勞工的權利意識及行動能量正在快速增長，並且試圖透過更大範圍的集體行動維護合理的權益。

（三）電子商務平台壟斷市場下的勞工權益

卡車司機罷工的另一個特點，是在其訴求中直指目前在中國大陸貨運行業中壟斷市場的電子服務平台「滿幫集團」是造成運費持續被壓低的元兇。各地卡車司機指控，「運滿滿」、「貨車幫」兩家公司（2017年底合併為「滿幫集團」），以 APP 軟體作為平臺，在貨運行業中扮演消費企業與卡車司機間的仲介服務。但在壟斷市場資訊後，滿幫集團持續以各種手段壓低司機運費來提高自身的利潤，導致卡車司機入不敷出卻又無力抗拒，最終只能採取罷工手段凸顯問題。

滿幫集團的作法，其實是近年來電子服務平台在中國大陸社會盛行下的普遍現象。在計程車行業中的「滴滴出行」、在餐點外送領域的「美團」及「餓了麼」，都是以「分享經濟」名義出現的新興營運模式。然而，這些電商服務雖然為消費者帶來便利，卻將自身的利潤基礎建立在對從業人員的剝削上。同時，在這些以新科技為載體的領域，由於勞資關係並非依循傳統的合約聘僱形式，也使勞工的權益難以獲得合理的保障。在此趨勢下，各地的「滴滴」司機以及「美團」的快遞員，也都在今年以來陸續投入罷工抗爭的行列。

整體而言，這次卡車司機的罷工行動，既是中國大陸社會新型勞資關係下的產物，也在動員機制與規模上超過了傳統的罷工抗爭模式，呈現出中國大陸勞工群體在維權運動上的強大生命力。與此同時，相關現象也說明雖然中國大陸政府持續強化其社會控制手段，並且試圖藉由各項社會福利保障的提高來換取支持，但仍無法有效的化解各類社會經濟發展矛盾及其引發的不穩定。在此情況下，勞工運動仍將不斷發展，並且持續衝擊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及政府的統治權威。

五、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觀察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馬振坤主稿

- 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安全對話，倡議自由開放繁榮的印太地區，旨在因應中國大陸日益強勢的海洋軍力擴張。
- 「印太戰略」重視印度的角色扮演，惟內涵混沌不明，四國對話無以為繼。
- 「印太戰略」搭配南海軍事行動和美中貿易戰，針對中國大陸明顯；惟各國對美中競爭保持距離，「印太戰略」未成區域共識。

（一）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呼應川普「印太戰略」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訪問亞洲之前，提出要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並且欲以此替代前任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川普雖然提出此戰略概念，但是卻未有具體內容與落實方法，即便其在原本亞太的概念上增加印度洋，看似擴充了歐巴馬總統界定的亞太範圍，其實早於 2012 年以前，時任歐巴馬政府國務卿的希拉蕊在出席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時，就已經明確表達美國對於亞太的認知包括印度洋。

隨著川普總統拋出「印太戰略」後，隨之而來的是呼應此戰略概念之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對話或稱四國同盟（QUAD）。在川普前來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東協暨東亞峰會之際，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四國官員亦同時舉行四方會議，強調各方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之共同利益。會後印度外交部公開表示，參加會談的美日印澳四國都同意，自由、開放、繁榮且包容的印太地區符合世界及所有區域國家的長遠利益。

在東協暨東亞峰會於菲律賓馬尼拉召開之際，與會的美國、日本、印度及澳洲官員首度舉行四方會談（2017.11.12），以爭取各方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共同權益。印度外交部表示，四國官員均同意，自由、開放、繁榮且包容的印太地區符合世界及所有區域國家的長遠利益。外界認為，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旨在因應中國大陸日益強勢的海洋

軍力擴張。

(二)「印太戰略」強調自由、開放概念

但此時川普總統之「印太戰略」仍然模糊，直到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次卿黃之瀚應記者提問，對「印太戰略」之內涵作了較為詳細之說明。黃對印太戰略之內涵特別強調「自由」與「開放」此二概念，其指出川普總統的認知中，自由的含義可分為兩個層面，「在國際層面，美國希望印太地區的國家不要受到強制威懾，可以按照主權國家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道路。在國家層面，美國希望印太地區國家，無論從政治、基本權益、從透明和反腐敗方面來說，愈來愈自由」。而美國對於開放的界定，則是指「開放的海上通道和空中通道」，這些開放的海上通道是該地區的生命線，開放的海上和空中通道對印太地區以及全球都非常重要」；另外，開放之意義還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印太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差距，需要更大的區域融合，更大的經濟增長。美國希望以正確方式協助區域各國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此類建設為真正能夠促進區域融合且提升國民生產總值的基礎建設設施，而不是增加區域國家的負擔。黃並明指，川普總統將「亞太」改為「印太」原因有二：一是印度在太平洋、東亞和東南亞發揮著重要作用；二是對美國的利益及印太地區的利益來說，印度也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印度為民主國家，存在著自由及開放秩序，印度將成為印太地區自由及開放之基石。美國的政策就是要確保印度之角色與作用愈來愈重要。

但「印太戰略」自川普總統去年 11 月提出至今，除了美國外，日本、印度、澳洲仍不充分了解此一戰略之具體內涵，以及對於相應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QUAD）之定位究竟為何，仍有歧見。印度總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發表演說時，並未提及四國同盟，而是強調印度之「印太戰略」是以印度與東協為核心，並且範圍擴及到非洲東岸。美國作為四國安全對話之首倡者，但國防部長馬提斯在香格里拉對話之演講中亦未提及此一名詞。可見川普總統倡議之「印太戰略」，由於內涵仍混沌不明，導致相應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無以為繼。

（三）分析與評估

雖然川普並未明言，但從「印太戰略」係取代歐巴馬總統之「亞太再平衡」政策視之，「印太戰略」具明顯的對中國大陸之針對性。雖然此一戰略內涵未明，但川普政府確實對中共採取較前任政府更為強硬之政策。除了將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擴充為印太司令部外，美軍機艦增加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任務頻率、以及拒絕解放軍參加在夏威夷舉行的多國海軍環太平洋演習。除了軍事層面較歐巴馬政府強硬，對中共發動貿易戰，在與北京進行貿易談判失敗後，川普政府宣佈對中共採取總值 5 百億美元之貿易制裁，並且在中共採取等值貿易報復措施後，再宣佈增加 2 千億美元之制裁，最新消息則是川普總統揚言美國打算對中共實施 5 千億美元的制裁，此數額等於是中共 2017 年對美貿易的總額。

中美貿易戰自 7 月 6 日正式展開至今，並無其它區域國家跟隨美國腳步採取對中貿易制裁措施。相反地，各國甚為擔心會遭到中美貿易戰波及，導致自身經貿利益受損。中美貿易戰乃逐漸形成中美兩國爭鬥、周邊國家切割置身事外之格局。

美國「印太戰略」在安全層面相伴而生之四國安全對話，未能形塑出明確有效之四國對話機制，在經貿層面衍成中美爭鬥之格局，其它國家皆避免被捲入。可知「印太戰略」之發展到目前為止，仍止於美國單方建構及具體操作機制之階段，尚未發展成為區域各國具有相同概念內涵、接受共同運作機制之印太區域安全機制。由此視之，川普政府之「印太戰略」能否繼自杜魯門總統之「圍堵」政策到歐巴馬總統之「亞太再平衡」政策之後，成為建構印太區域安全秩序之依循，尚待觀察。